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一百零二期
2024年11月　　頁103~139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411_(102).04

在「左翼魯迅」論述掩蔽下——初論1920年代馬華文壇中的「五四魯迅」

許　德　發*

摘　要

1930年代之後，由於中國左翼思潮的興起與馬來亞本土情境作用下，馬來亞華人實踐及形塑了自身的「左翼魯迅」論述。這一論述使得魯迅作品及其思想於1930年代之後的殖民地馬來亞更廣為流傳，長期作為兩種革命——政治的與文學的介面，影響馬華思想與文學，但也暴露出對魯迅認識的盲點與意識形態化。對「左翼魯迅」傳統之研究首推馬華文學史家方修、章翰等人，往後駸駸然形成馬華「左翼魯迅」研究建構。然而魯迅一生實非「左翼」可涵蓋，但在他們的論述下，一個複雜的、尤其是五四時期的魯迅卻「不見」了，「五四魯迅」為「左翼魯迅」所掩蓋。本文依據有限的報刊資料初步勾勒「左翼魯迅」形成之前馬華文壇中的魯迅，並略追尋五四時期馬華文壇情境，以揭示魯迅在1920年代馬華文壇中的多元呈現與複雜面向，以及他所處的位置，以還原「左翼魯迅」研究建構下所不見的「五四魯迅」。

關鍵詞：「左翼魯迅」　「五四魯迅」　1920年代馬華文壇　馬華「五四」新文學情境　「社會人生—藝術」

2023.04.28收稿，2024.02.22通過刊登。

*馬來西亞國立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科高級講師。
Email: khor_teik_huat@fbk.upsi.edu.m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 the Shade of the "Left-wing Lu Xun" Discourse–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May Fourth Lu Xun"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1920s

Khor, Teik-huat*

Abstract

After the rise of leftist thought in China in the 1930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social condition in Malaya, the Malayan Chinese have accordingly practiced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Left-wing Lu Xun" discourse. This discourse facilitated the wider dissemination of Lu Xun's works and ideas in Malaya's colonial society after the 1930s, and served as an interface between two kinds of revolutions—the political and the literary. Although the discourse remained influential in Malayan Chinese thought and literature, it simultaneously exposed the blind spot and ideological prejudice in understanding Lu Xun. As the study of the "Left-wing Lu Xun" tradition was initially advocated b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ians such as Fang Xiu, Zhang Han and others, who subsequently established a robust scholarly framework on this subject. Nonetheless, while Lu Xun's life cannot be solely determined by "leftism," the discourse formulated by Fang Xiu and the other scholars has overshadowed the "May Fourth Lu Xun"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bscured the complicacy of Lu Xun's thought. In short, the context of the "May Fourth Lu Xun" was submerged in the notion of the "Left-wing Lu Xun."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trace and outline Lu Xun's presence and influence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Left-wing Lu Xun" based on investigating limited newspaper sources. Additionally, the paper briefly explores the literary context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by discerning the multifaceted and complexified layers of Lu Xun's thoughts and position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1920s, aiming to restore the overlooked "May Fourth Lu Xun" under the construct of "Leftist Lu Xun" research.

Keywords: "Left-wing Lu Xun," "May Fourth Lu Xu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20s, Malaysian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situation, "Social Life-Art"

* Senior Lecturer,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Email: khor_teik_huat@fbk.upsi.edu.m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魯迅（1881-1936）一生並未到過南洋，即便許廣平（1898-1968）在抗戰時曾考慮攜帶魯迅子嗣海嬰「下南洋」，並曾探問於「滯留南洋」的郁達夫（1896-1945），但最終並沒去成。[1]然而，魯迅的作品及其思想、精神卻實實在在地曾「下南洋」，而且再生產了不少「南島魯迅」。許多學者業已指出，近現代東南亞華人，尤其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思潮是中國近代思想的延伸，魯迅即是在此一脈絡下緊隨著現代中國文學與思潮「下南洋」，並長期作為兩種革命——政治的與文學的介面，影響了華人思想與文學。然而，儘管馬來亞華人社會與近代中國有著思想順延的脈絡關聯，可是它自有其地方性與政治文化語境，因此「南洋魯迅」是一個經過區域化的魯迅。自 1930 年代，由於中國左翼思潮的興起以及本土情境的作用下，南洋華人更相信寫作的力量及魯迅的人格表現多於其文學現代性，因此一個「戰鬥性」的「左翼魯迅」論述逐漸興起，並形塑為一論述傳統，成為馬華文壇及社會一股不夠深刻但激越的左翼傳統的一部分。然而，客觀上「左翼魯迅」傳統雖起著振奮馬華社會對抗當時殖民統治與現實黑暗的作用，但同時也暴露出對魯迅認識的盲點與意識形態化。在馬華文學研究上，對「左翼魯迅」傳統之研究首推馬華文學史家方修、章翰等人，往後駸駸然形成了馬華文學史「左翼魯迅」研究之建構。

眾所周知，魯迅一生並非「左翼」一詞所可涵蓋，對他的理解也不得不追溯到五四時期。但是，前述「左翼魯迅」研究在馬華文學史家方修、章翰所建構底下，其研究起始卻以 1930 年為源頭，魯迅似乎不存在於 1920 年代。南治國在其〈寂寞的魯迅——魯迅與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一文中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然而他追查了現有的二手資料，包括方修與章翰的著述，也承認「魯迅在 1920 年代的新馬文壇是寂寞的」。[2]故此，現有「左翼魯迅」研究大都以

1 郁達夫，〈離亂中的作家書簡〉，《郁達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第 6 卷（書信），頁 308。

2 南治國，〈寂寞的魯迅——魯迅與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魯迅研究月刊》2002 年第 6 期，頁 46-50。作者認為以方修對魯迅之熱愛，若發現魯迅不可能不加以引述，然而方修自認翻閱過 1920-1923 年的刊物，但只抄錄「若干最早期的作品，但這些資料都已不在手頭」，他手上所有的資料僅限於 1924 年前後極少的一部分副刊，即《新國民日報》、「小說世界」、「婦女雜誌」的一些散頁。見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1962），頁 36。方修在《馬華新文學史稿》所引述的《南洋商報》副刊資料，最早也只限於 1924 年 7-9 月的篇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30 年署名「陵」、[3]一篇批評魯迅的文章為起點，似乎除此之外便別無他文。在這樣研究與論述下，一個複雜的、尤其是五四時期的魯迅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存在卻似乎「不見」了，五四「現代性的魯迅」已為意識形態化的「左翼魯迅」所掩蓋，黃錦樹甚至直言批評，「一整代的南洋魯迅讀者，其實沒留下甚麼有意義的文學遺產」。[4]顯然，由於新馬對魯迅的研究已經幾乎完全被「左翼魯迅」傳統所壟斷，挖掘已經被徹底忽略的五四時期魯迅形象與位置成為了一種必要，正如王汎森曾認為的，有必要檢視晚清民初已被激烈思想壓下去、或逐漸被遮蓋、掩蔽的概念那樣，它雖然已不再是主流的聲音，但依然存在。他進而指出，對這些「執拗的低音」的「重訪」，意在於從問題被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與邊緣的分叉點，能使新、舊各種學術資源成為並置的、多元的、開放的資源，而並非要取代主流。易言之，隨著時代的新陳代謝，「重訪」能豐富我們對歷史的了解，同時豐富我們的歷史資源。[5]因此，本文嘗試追溯與集中於魯迅與 1920 年代馬華文壇的相關聯，釐清五四時期的魯迅在新馬的實際現象與位置。在現有「左翼魯迅」研究中，1920 年代馬華文壇魯迅資料極少，其空白值得我們去勾稽與填補。本文將嘗試依據已有的有限報刊資料初步追索「左翼魯迅」形成之前馬華文壇中的魯迅，探析魯迅在 1920 年代馬來亞文化語境下、思想未激化之時的多元呈現與複雜面向，以揭示「左翼魯迅」論述建構下所不見的「五四魯迅」。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年限至 1930 年為止，因為這一年是過去「左翼魯迅」研究的起點，也是馬華文壇左傾的開始。由於資料之缺乏及零散，本文也將結合馬來亞 1920 年代文化與文學情境加以勾勒魯迅，並將他視為「五四」的一部分，以尋找 1920 年代魯迅的確切位置。

二、馬華「左翼魯迅」之建構及其闕失面

基本上，馬華「左翼魯迅」是一從中國大陸移植的思想現象，與中國的政治與思想變遷相關聯。正如王富仁所指出的，1927 年隨著北伐成功、國共分裂之後，政治上被分為左、中、右三個不同派別，當時的魯迅研究是在社會大

3 陵，〈文藝的方向〉，《星洲日報》第 19 版（副刊「野葩」第 9 期），1930 年 3 月 19 日。

4 黃錦樹，〈會意：隱喻與轉喻的兩極〉，《中山人文學報》第 45 期（2018 年 7 月），頁 37。

5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 1-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裂的狀態下進行的，這個時期是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場上來感受和認識魯迅的。[6]在 1927 年前後複雜的政治語境變化下，後期創造社、太陽社青年作家和魯迅等作家之間發生了「革命文學」論爭，他們認為「阿 Q 的時代已經死了」，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作家理應受到徹底批判。[7]但是，由於接到中共黨中央高層的指示，他們被迫與魯迅言和，1930 年 3 月魯迅加入左聯，之後瞿秋白（1899-1935）、茅盾（1896-1981）等人有意識的把魯迅塑造為左翼文學陣營的精神領袖，[8]繼而經由毛澤東（1893-1976）、胡風（1902-1985）等人的努力，「左翼魯迅」傳統於 1930、40 年代獲得進一步的推進。然而，加入左聯的魯迅很快就與部分領導人之間發生矛盾，這主要原因是左聯並非一個純粹性的文學社團，它表明魯迅的啟蒙邏輯和周揚（1907-1989）等人的政治邏輯是相互抵牾的，由此顯見「追求自由的魯迅」與並不自由的左翼的矛盾此消彼長，因此「左翼魯迅」並不能闡釋 20 世紀 30 年代魯迅的真實人格。據禹權恒指出，可以這麼說，自 1927 年至 1936 魯迅去世之間，在上海這一都市文化場域之中，後期創造社、太陽社青年作家、左翼、中國共產黨、國民黨等各種力量，都對魯迅形象進行了各種「暴力命名」。[9]

與上述背景相呼應，自 1930 年代開始，魯迅在新馬華人社會也逐漸取得了權威的地位。據王潤華的看法，這並非通過對魯迅作品的閱讀產生的文學影響，而是經過左翼政治的興起而取得的。[10]王潤華認為，中國左翼作家與文化人隨著 1927 年北伐、1937 年抗戰之後移居新馬，而正是他們為魯迅做了非文學性的政治、民族、思想意識形態的建構。實際上，北伐之後南來的文人多因國民黨清黨而移居南洋，比如許傑（1901-1993）等人，可以說整個中國知識界之逐漸趨向階級鬥爭，也直接衝擊了新馬文壇。在這些南下的中國作家中，有一些左派青年如張天白（丘康，1902-1976），成為把魯迅神話移植到新馬的大功臣。[11]當時新馬文化人對魯迅的推崇，特別強調了魯迅的戰鬥精神、民

6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頁 24。

7 禹權恒，《上海魯迅——形象建構與多維透視（1927-193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 3。

8 同上註，頁 58、67。

9 同上註，頁 4、2。

10 王潤華，〈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7），頁 128。

11 同上註，頁 1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英雄形象、年輕人導師等。[12]不難理解，這自然造成馬華社會中的魯迅是一個「左翼」的魯迅。此後，隨著 1940 年代二戰前後新馬華人社會捲入了激越的反殖民左翼思潮之中，魯迅也隨此思潮成為了難以匹敵的反殖偶像。如上所述，魯迅此一地位後來經過章翰與方修在文學史研究上的書寫建構，開啟了魯迅的特殊文學史地位及文學上的「左翼魯迅」傳統。章翰最早特別研究魯迅與馬華文學的關係，他在 1970 年代就寫了《魯迅與馬華新文藝》，[13]文章以 1930 年代以後為限，建構了「左翼魯迅」文學之歷史敘述，往後書寫「左翼魯迅」文學傳統的研究逐漸豐富，許多研究多將魯迅置於新馬左翼或反殖民角度加以論述。[14]馬華文學史家方修則將魯迅高舉為「徹底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15]魯迅成為現實主義文學史書寫的標準，可謂進一步鞏固了「左翼魯迅」文學之傳統。

正如上面已多次提及的，「左翼魯迅」文學傳統之建構只從 1930 年說起，章翰、方修等人談魯迅的影響，也立基於 1930 年代及之後的資料，然而，儘管他們同時亦推譽魯迅為五四以來新馬華文文壇最具有影響的主要作家，但卻對 1920 年代的南洋魯迅語焉不詳。章翰在《魯迅與馬華新文藝》指出，「魯迅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已受到馬華文藝界的重視」，卻沒有任何資料佐證。[16]方修著名的《馬華文學史稿》雖以 1919 年為馬華文學的啟端，但在論及中國五四新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時，方修僅指出中國著名作家如魯迅、郭沫若（1892-1978）、巴金（1904-2005）、艾青（1910-1996）、臧克家（1905-2004）、田間（1916-1985）等人的作品風格，都曾成為馬華作家學習或模仿的對象，[17]對魯迅出奇的輕描淡寫。方修的《馬華文學史稿》中魯迅名

12 同上註，頁 130。

13 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新加坡：風華出版社，1977）。

14 如王潤華，〈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頁 123-144；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頁 183-192；南治國，〈魯迅在新馬的影響〉，《華文文學》2013 年第 5 期，頁 72-77；王瑜瑛，〈馬華文學界的魯迅觀〉，《社會科學戰線》1995 年第 3 期，頁 211-214；鄒賢堯，〈殖民語境中魯迅與馬華文學〉，《魯迅研究月刊》2005 年第 11 期，頁 36-40；張康文，《馬華文壇的「魯迅記憶」及其意涵（1945-1965）》（丹絨馬林：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文學碩士論文，許德發先生指導，2018）等。

15 方修，〈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頁 46。

16 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頁 2。

17 方修，〈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的出現已是上卷的第 258 頁，而馬華新文學史也已經走到了 1930 年的 3 月：[18]

> ……這是一位署名「陵」 的作者提出的。他寫了一篇《文藝的方向》說道:「……我覺得十餘年來中國的文壇上還只見幾個很熟悉的人把持著首席；魯迅，郁達夫一類的老作家還沒有失去青年的信仰的重心，這簡直是十幾年來的中國文藝絕對沒有推向前一步的鐵證。本來像他們那樣過重鄉土氣味的作家承接十九世紀左拉自然主義餘緒的肉感派的東西，哪裏能卷起文藝界的狂風？……」。[19]

顯然，方修所引述的作者「陵」受到當時中國國內由創造社和太陽社發起的圍攻魯迅、聲勢浩大的文化論戰的影響，已經對魯迅展開激烈的批評。這一篇評論文章常被作為「左翼魯迅」敘述開始前的重要轉折實證。無巧不成書，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也以此文為啟端，討論了魯迅在新馬的起源。[20]故此，我們所能看到的自然都是一個充滿戰鬥性的、與政治緊密關聯的、被高舉的「左翼魯迅」形象，此外別無其他，彷彿「左翼魯迅」之前沒有「史前史」。

證諸於史，自 1930 年代開始，魯迅及其作品確實在殖民地時期的馬來亞廣為流傳，他客觀上起著振奮社會對抗殖民與現實黑暗的作用。它與大陸左翼所提倡的魯迅「戰鬥精神」形象相契合，而起到了左翼思想與政治統一陣線的作用。具有政治意義的「魯迅闡釋」獲得到馬華社會的呼應，但同時卻也暴露出對魯迅認識的盲點與意識形態化，尤其是，魯迅的作品於 1950、60 年代為左翼青年所最愛，甚至形成為一個可以與毛澤東互換的隱喻，在文學上多的是降格模仿，只會寫一堆雜草式的雜文。[21]

徐紀陽曾在論述魯迅在臺灣的早期傳播中指出，1930 年代以後，臺灣對魯迅思想與左翼文藝理論的吸收，主要是通過日本綜合雜誌與左翼文化陣線翻

亞》，頁 51。

18 南治國，〈寂寞的魯迅——魯迅與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頁 47-48。

19 陵，〈文藝的方向〉，《星洲日報》第 19 版（副刊「野葩」第 9 期），1930 年 3 月 19 日。

20 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頁 3。

21 黃錦樹，〈會意：隱喻與轉喻的兩極〉，頁 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譯、評論、出版等傳播魯迅的渠道。[22]他進而指出，左翼文化界所塑造的「魯迅形象」斫斷了與魯迅精神本體的聯繫，即「中間物」的概念、「尋路者」的自況，孤獨、寂寞以至悲觀、絕望等在魯迅精神中具有獨特意義的思想範疇被有意忽略。然而，魯迅恰恰就是在這種孤絕、懷疑的精神狀態中才得以深刻認識中國文化的內在機理，而一旦丟棄了魯迅精神中的這些內容，也等於放棄了魯迅深邃的文化批判思想得以產生的內在邏輯方式。因此，對魯迅精神遺產的借鑒若未能進入魯迅思想深處的內省層面，亦將無法延續魯迅文化批判的思考邏輯，並由此對新的歷史動向作前瞻性的判斷。[23]實際上，徐紀陽所論亦同樣可以轉移來論述新馬的「左翼魯迅」傳統，從目前的新馬魯迅研究來看，當代馬華文學魯迅學研究所忽略的，也恰恰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得不到彰顯的一種歷史可能性。[24]

論述至此，我們不得不追問，「左翼魯迅」傳統史前史中的「五四魯迅」去了哪裡？正如王富仁所言，魯迅在中國五四時期是一個「社會人生派的魯迅」，如此說來，新馬顯然少了一個「人生-藝術的魯迅」，也缺乏「馬來亞魯迅」的最初起始。實際上，1930 年代在大陸，與「左翼魯迅」同時並行的還有以李長之為代表的「人生-藝術」派的魯迅研究，它與以梁實秋、蘇雪林為代表的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魯迅研究，以及「左翼魯迅」並列，形成了整體但各自思想立場不一的「魯迅傳統」，[25]但這些在新馬都被隱沒掉了。

三、「左翼魯迅」史前史：1920 年代「五四魯迅」在新馬之重構

至今為止，對於魯迅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新馬文壇地位稍有論及的，恐怕只有王潤華。他在〈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中指出，魯迅在二十年代「雖然已是知名作家，但他的知名度與地位並沒有特別重要，新馬逐漸擡頭的左派作家反而嫌他思想不夠前衛……這時候郭沫若就比魯迅有號召力……。」[26]顯然的，王潤華的「逐漸擡頭的左派作家反而嫌他思想不夠

22 徐紀陽，〈「魯迅傳統」的對接與錯位——論光復初期魯迅在臺傳播的若干文化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6 期，頁 71。

23 同上註，頁 77。

24 同上註，頁 78。

25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頁 5-24。

26 王潤華，〈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王潤華、潘國駒主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衛」立論基礎應該同樣來自於上文提及的 1930 年代署名「陵」 的作者之評述，亦無任何具體證據。此外，所謂「這時候郭沫若就比魯迅有號召力……」也缺乏明確時間段的陳述。如上所述，基於早期馬華社會與中國近現代思想之間的共時性，我們若要了解「左翼魯迅」史前的南洋魯迅——「五四魯迅」在新馬——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五四時期魯迅的實際地位，才能藉此追尋魯迅在馬華文壇的位置。

（一）馬華文壇中的「人生-藝術」魯迅

對於五四時期的魯迅形象與地位，王富仁已經在其著作《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做了細緻的勾勒。據他指出，對魯迅及其作品的實質研究起於五四時期，而直至 1928 年期間，當時魯迅地位還不具有任何權威性，對其作品的評價和闡釋，讀者是根據自己的標準很自然的建立起來的，因而也反映著魯迅作品在各種不同標準上面所呈現的各種不同的價值。[27]在這一時期，論者根據對魯迅作品的不同評價方式和感受方式，對魯迅作品的研究可分成三個不同的派別：一、**凡是在當時中國的社會人生中感到了人生的苦悶、有著改良這人生的願望並也從這個角度感受魯迅作品、評價和分析魯迅作品的讀者，都對魯迅作品有著肯定性的評價，並能同時感受到他們在藝術表現上的深刻有力。由這一部份魯迅研究作品構成了一個相對統一的派別：魯迅研究中的社會人生派。**[28]二、凡是僅僅從藝術表現的角度衡量魯迅作品，而對它的社會人生表現無所感受或極少感受的人，這以成仿吾為代表，他們可稱為青年浪漫派的魯迅研究。三、脫離魯迅作品的社會人生目的，而僅從人與人的關係理解並評價魯迅及其作品，就會走向對魯迅及其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的全面否定，它以陳源為代表。[29]

此外，這個時期的魯迅地位或研究主要還停留在針對魯迅的前期小說，並且由於與魯迅處於同一歷史時期，魯迅的自我還沒有得到更充分的展示，因而也不可能對魯迅做有距離的、歷史的整體把握。[30]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前述，當時魯迅仍不具任何固定的權威性，評價是靠讀者對他的作品的實際感受建立起來的，而不是源於當時的社會評價或者意識形態，這種情況到後來有了根本

《魯迅在東南亞》，頁 125。

27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頁 6-7。

28 同上註，頁 6。

29 同上註，頁 6-7。

30 同上註，頁 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變化，感受與評價有了彼此孤立的可能。[31]實際上，這一論述恰好提供一個絕佳角度關照同個時期新馬文壇中的魯迅，正如前引王潤華所言，新馬「左翼魯迅」同樣是建立在權威的、不是「靠讀者對他的作品的實際感受建立起來的」。

此處我們也必須稍微先概括理解當時馬來亞文壇的「五四境況」。一般認為，創辦於 1919 年《新國民日報》標誌著五四新文學在馬華社會的登陸。但我們回頭來看馬華文壇，五四新文學在馬華社會其實起步甚遲。證諸於史料，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胡適（1891-1962）發表於 1917 年《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必須等到 1922 年才轉刊於《新國民日報》。[32]整體上，五四思想的啟蒙尤其是教育改革在新馬的流傳更早及更廣，許多五四的重要概念如通俗學校、禮俗革新等於 1920 年前後就已經興起。[33]以《新國民日報》論，它更著力於提倡新思潮而非新文學。主編張叔耐（1895-1939）在 1919 年《新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雜誌」創刊時，即曾特別強調其設立主旨在於「倡議實業與發展教育」，這使得其於宣傳五四新思潮方面是有失偏頗的。[34]這實際上有其特殊的南洋背景，由於南洋的新式小學教育興起於 1911 年之後，此時恰好方興未艾，而南洋是一個勞工階層與商人階層為主的社會，急需「實業」的提倡。因此，據梁家逕的研究，從 1919 年至 1923 年間，新文學在「新國民雜誌」上的價值更多僅是一種依附性質，這導致了馬來亞華文新文學的某種特點，同時也因稿源問題，所刊載文章是以編者抉擇為主，而有其局限。[35]比如，在針對白話文教育方面，編者也基於其精英主義立場，回到保守的態度，立場有矛盾之處，造成五四思潮引介的不全面。依據方修與苗秀的研究，大約遲至 1925 年以前，當時舊文學仍與新文學相混。[36]苗秀在其《馬華文學史話》裡曾就「醞釀時期的馬華小說創作」談及，「新國民雜誌」雖已出現白話文，亦提倡新思想，然而這個副刊大部份內容仍舊是舊詩詞、文言筆記小說等

31 同上註，頁 15。

32 《新國民日報》遲至 1922 年 6 月 29 至 7 月 17 才刊登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

33 許德發，〈啟蒙、辦學與演說：五四時期馬來亞華人的社會改革與風氣〉，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辦，「在路上：第二屆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吉隆坡，2019 年 12 月 28-29 日），未刊。

34 梁家逕，〈五四在南洋的思想軌跡：以《新國民日報》（1919-1923）為探討對象〉，《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3 期（2020 年 9 月），頁 34-35。

35 同上註，頁 39。

36 苗秀，《馬華文學史話》（新加坡：青年書局，1968），頁 11；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頁 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舊文學作品。此時，另一份主要報紙《叻報》的「附張」、「文藝欄」和「叻報俱樂部」（1923 年創刊），以及《南洋商報》的副刊「新生活」（1923 年 9 月創刊）及稍後的「商餘」雜誌也只以一部份篇幅刊載當地寫作人所寫的白話文創作。1924 年 19 月 25 日《新國民日報》專門設立發表小說的副刊「小說世界」，仍舊強調文言語體並用，文白兼收。[37]一般馬華文學史研究者都認為 1925 年隨著第一份純白話文藝副刊「南風」之創刊，才正式標誌著新文學運動的出現，而這之前並未形成一個明確的運動。[38]如上所述，胡適的五四新文學改革號角之作〈文學改良芻議〉也延後 5 年之久才見於馬華文壇。易言之，五四在新馬新文學的真正開展比中國大陸滯後數年，魯迅在當時馬華文壇的位置，也與這一傳播滯後相符。

故此，馬華文壇似乎未及立即接觸 1919 年以前的魯迅小說，如《狂人日記》等，因而也無法對它們做出反應。依據筆者的研究，現有最早一篇討論魯迅的文章是刊於 1923 年《南洋商報》、署名惜抱的一篇文章。它雖不是一篇專門評論魯迅的文章，卻讓我們看到最早的南洋魯迅印象與線索：

> 近幾年來中國的創作界，在我看來，還很有點可喜的現象，雖然我對於翻譯的作品，比較看得鄭重。但魯迅、冰心、朱自清、許地山的作品，已經能感動我們而給我們很深的印象。為什麼他們的作品會有這樣的魔力呢？因為他們都具著：（一）絕對的個性、（二）細膩的描寫、（三）沒有衝動便擱了筆的特能。當我們讀到〈阿 Q 正傳〉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位素不相識的天才作家——巴人——是多麼急切的想曉得他的一點文藝養成的歷史！我們想，現在的天才而熟練於藝術的作家，是可以屈指數的；怎末〈阿 Q 正傳〉的作者，有了這樣成功的作品，還會沒有被我們知名？同時我們覺得這篇活躍躍的、描寫的，充滿了滑稽色彩的〈阿 Q 正傳〉，只有魯迅能夠做得出來。因此我們便懷疑，這恐怕是魯迅做的。果然——不久竟證實巴人便是他的化名。——一直從前，他並沒有用過這化名發表藝術作品及其他：——我們很喜歡我們的賞鑑力很不錯，並且因此而越信無論誰，如其在他的作品裡可以看出作者的個性的，就是沒有署名，我們一看見到，便曉得作者到底是誰。因為——例如

37 苗秀，《馬華文學史話》，頁 10-11。
38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頁 5；苗秀，《馬華文學史話》，頁 13、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魯迅□〈風波〉、〈舊鄉〉、〈兔和貓〉、〈不周山〉、〈白光〉、〈端午節〉、〈社戲〉這幾篇，除了〈故鄉〉寫得最莊嚴——相對的——之外，無論那一篇、那一處，都可以滑稽的描寫的作者的個性，但故鄉裡的楊二嫂，卻又免不了描寫的很滑稽：我們既然認清滑稽的描寫是魯迅的個怪的表現，又何難□出〈阿 Q 正傳〉的作者的真姓名——（？）——有人說魯迅是周作人的兄弟叫樹人的作品，我們沒有見看過，未敢遽武斷是非，但是魯迅文字裡的「我們魯鎮」、「迅哥們」，用得十分認真，我們覺得似乎不是化名。[39]

引文中提及的〈風波〉創作於 1920 年 8 月、〈故鄉〉創作於 1921 年 1 月、〈阿 Q 正傳〉發表於 1921 年 12 月、〈白光〉與〈端午節〉皆創作於 1922 年 6 月、〈兔和貓〉創作於 1922 年 10 月、〈社戲〉寫於 1922 年 10 月，而〈不周山〉發表於 1922 年 12 月。惜抱所引述的魯迅小說都收於 1923 年 8 月出版的《吶喊》小說集，[40]而《南洋商報》刊登惜抱文章於同年 9 月，可見此時馬來亞文壇已幾乎同個時間接觸到魯迅《吶喊》小說集。在文章中，作者也以冰心（1900-1999）為例，批評了馬華文壇「不特不曉得什麼是描寫、什麼叫個性，並且連一點內部的衝動都沒有便提起筆……硬作出一篇千篇一律的、記賬式的小說來」。[41]易言之，魯迅被認為是一個有個性的、描寫細緻、成熟的、有內在創作衝動的作家，馬華文化界似已將魯迅作品作為新文學的典範而接受。但是，作者認為魯迅的特色在於「滑稽」，[42]雖也有其確切的一面，但並不全面，這其實也不完全令人訝異，因為中國評論界亦有類似評論。魯迅自己就說，在《吶喊》出版之後，「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為是病的，也有以為滑稽的，也有以為諷刺的；或者還以為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真藏著可怕的冰塊」。[43]有

39 惜抱，〈文藝家應具的條件〉，《南洋商報》第 13 版，1923 年 9 月 26 日。

40 〈不周山〉在 1930 年《吶喊》第 13 次印刷時被移出，之後才被魯迅改題為〈補天〉，並收入於另外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之中。見朱文琦，〈魯迅《吶喊》中移出〈不周山〉的原因探究〉，《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19 年第 1 期，頁 64。

41 惜抱，〈文藝家應具的條件〉，《南洋商報》第 13 版，1923 年 9 月 28 日。

42 所謂魯迅小說特色具「滑稽」面向，到了「左翼魯迅」論述形成之後，是難以想像的，因為魯迅是嚴肅的、戰鬥的戰士／聖人。

43 魯迅，〈俄文譯本《阿 Q 正傳》序〉，《集外集》，《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趣的是，作者還不知道「魯迅就是周作人的兄弟樹人」，似乎也透露當時馬華文壇對魯迅仍不完全的熟悉。

儘管魯迅已被高度評價，[44]但從可見及的資料來看，直到 1927 年，似乎才看到仿寫魯迅小說的痕跡。[45]一位署名天放的作者在《洪荒》刊物發表了〈瘋子的日記〉。從表面的題目來看，它似乎受到〈狂人日記〉的啟發，但其體式卻又不是採用日記體，只是運用了自敘方式敘述自己的經歷。小說連載三期，內容分成兩個部分，但缺乏明確主題，第一部分敘述童年與鄰居小孩打架的回憶，第二部分較長，有些自怨自艾地敘述自己在新加坡的的生活心情，包括愛情的失意、朋友的冷待以及現實中遇到的貪小便宜、虛偽的愛情等，似乎要揭示「人類自私自利的根性」，但寫得散亂、隨意。[46]楊松年也批評此文「篇章雖長，但欠缺一個中心故事，而且所欲表露之思想也不深刻」。[47]

此外，一位署名超民的作者在一篇評論近代中國文學思潮時，指出近代中國文學傾向於自然主義，「只忠實地將現實醜惡畸形的社會反映出來，不滲一點喜怒，是好是壞，只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去批評」，文中引述了廚川白村（1880-1923）言論加以說明。[48]他首先立即舉了魯迅作為例證：

> 只是我怕一談到現代的文學，我們便馬上想起被稱為思想界的權威，自然主義派的健將周魯迅。他有極高的天才，極豐富的創作

學出版社，2005），第 7 卷，頁 84。

44 我們也可從《南洋商報》對魯迅就任廈大教授特別報導，看到南洋華人對魯迅的評價。「廈大開校後，新聘教授魯迅聞已由滬搭新疆船來，星期六可到廈。魯迅君為文藝大家，其惠然肯來就廈大教授，實為廈大之幸」，接著大篇幅介紹魯迅的著作。見南洋報社，〈廈大新聘教員將到校〉，《南洋商報》第 10 版，1926 年 10 月 13 日。

45 必須說明的是，魯迅〈狂人日記〉發表後，中國文壇似乎也出現了的重寫/改寫〈狂人日記〉形象，如 1922 年 5 月《晨報副刊》連載槐壽（周作人）的〈真的瘋人日記〉，同一年還有冰心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瘋人筆記〉。因而，「天放」或也是這股潮流的參與者，而非魯迅〈狂人日記〉影響下的直接產物。

46 天放，〈瘋子的日記〉，《南洋商報》第 13 版（副刊「洪荒」），1927 年 8 月 18 日、8 月 25 日、9 月 1 日。

47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報刊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頁 79。

48 超民，〈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趨勢（三）〉，《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4 月 12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力，以尖利的筆鋒，銳敏的觀察，以客觀的態度，將現實社會的畸形狀態、醜惡、悲哀，如實地表現出來。他因為不安於社會，看不過怪象，所以有此動人之筆打入讀者心裡深處，使讀者看了，出一種寂靜的悲哀，而體驗出自己的生活內容來，同時與作者燃燒起同樣的火焰，生出共鳴共感。作者所深切的感到過的苦悶，想過或做過的一切生活，就是讀者自己的苦悶、自己的生活。**廚川白村博士說過，「所以文藝作品所給與者，不是知識而是喚起作用。刺激了讀者，使他自己喚起自己的體驗內容來，讀者受了刺激而自行燃燒」……**。魯迅的作品，已到了這種境界，我們看他所作的短篇小說，完全是揭露現實社會的醜惡，是時代生活的反映，而他自己又以客觀的冷靜的態度寫出，表面看起來，作者好像是厭惡、憎恨，而實際是抱著無限的同情與憐憫的，我們讀他的《吶喊》，自己心裡也在「吶喊」，讀者讀〈阿 Q 正傳〉，感覺是被壓迫被侮辱的人們底心靈的悲哀，不禁發出一種深切的憐憫與同情，再讀〈孤獨者〉、〈傷逝〉等篇，更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狀態，然而終於苦惱地徬徨著、在茫茫的歧路上，而無法前進哩。[49]

引文可見作者對魯迅仍然高度推崇，稱魯迅為「思想界權威」，並以魯迅小說為例，指出魯迅出色的天才、創作力、尖利筆鋒、銳敏的觀察與客觀的態度，使讀者生出共鳴共感，並能體會作者深切的苦悶。作者將五四文學歸納為「自然主義」並不完全正確，尤其指這種寫作「無法前進」，但基本上卻肯定了這一思潮，認為這是所謂的「人生的藝術」，且其趨勢有社會現實作為基礎，並非偶然，而「為藝術而藝術」的浪漫主義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50]顯然，以上有關魯迅評論基本上都是抱著一種「人生的藝術」的角度來解讀魯迅，同時對魯迅有高度評價。從以上兩則資料引文可知，新馬文壇對魯迅並不陌生，提及現代文學也首推魯迅，但對魯迅的認識都談不上深刻，基本上也都從王富仁所說「社會人生-藝術」角度來認識魯迅，「**都對魯迅作品有著肯定性的評價，並能同時感受到他們在藝術表現上的深刻有力**」，[51]符合了王富仁所論述的「五四魯迅」形象。這裡必須順帶一提，作者所引廚川白村原文其實來自於魯

49 超民，〈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趨勢（四）〉，《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4 月 13 日。
50 超民，〈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趨勢（六）〉，《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4 月 16 日。
51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頁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迅《苦悶的象徵》譯本。[52]

追溯起來，在現有新馬「魯迅研究」中最早被引用的有關魯迅資料是1926年的一則文論，即刊於該年4月份《星光》周刊第46期上、由南奎執筆所寫的〈本刊今後的態度〉。該文字如下：

> 我們深願盡我們力之所能地掃除黑暗創造光明。我們還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決不是登高一呼萬山響應的英雄，只不過在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願寂寞，忍不住的吶喊幾聲「光明！光明！」倘若這微弱的呼聲不幸而驚醒了沈睡的人們的好夢，我們只要求他們不要唾罵，不要驅逐我們，沈睡者自沈睡，吶喊者自吶喊，各行所是。那就是我們唯一的祈求。……這樣黯淡的星光、這樣微弱的呼聲、思想，是這般的幼稚，文字，是這般的粗率，竟能得到社會的如許的同情。我們那得不努力，那得不興奮，那得不振作，那得不使這暗淡的光照澈這陰霾的宇宙，那得不使這微弱的呼聲驚醒酣睡的人群？[53]

顯然，引文字裡行間模仿了魯迅著名的「鐵屋中吶喊」的寓意，其所提及的「沉睡者」與「吶喊者」皆來自魯迅發表於1923年8月21日《晨報·文學旬刊》上的〈《吶喊》自序〉。實際上，魯迅將小說集命名為「吶喊」，依照他在〈《吶喊》自序〉中的解釋：「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使他們不憚於前驅」。[54]故，其「搖旗吶喊」之意，並非衝鋒陷陣，而是為了慰藉寂寞的啟蒙者，但在主流的想像中，魯迅似乎變成了衝鋒陷陣的棋手了。[55]南奎此文被現有論者認為，可證明至遲魯迅及其作品已於1926年4月傳到新馬兩地，並產生影響，[56]但顯然這個推論並不正確，如上所述，至少1923年《吶喊》出版該年，馬華文壇即已討論了此本小說集。

---

52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徵》（臺北：五南出版社，2020），頁65-66。

53 段南奎，〈本刊今後的態度〉，《叻報》（副刊「星光」第46期），1926年4月20日。

54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頁441。

55 汪衛東，〈何謂「吃人」？——《狂人日記》新讀〉，《國際魯迅研究》第1輯（2013年8月），頁16。

56 南治國，〈寂寞的魯迅——魯迅與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頁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我們若將引文聯繫到王富仁上文所指陳的，「凡是在當時中國的社會人生中感到了人生的苦悶、有著改良這人生的願望並也從這個角度感受魯迅作品、評價和分析魯迅作品的讀者，都對魯迅作品有著肯定性的評價，並能同時感受到他們在藝術表現上的深刻有力」，南奎文章的含義在於，他進一步透露了**魯迅苦悶式「吶喊」正在南洋起了作用**。

（二）《苦悶的象徵》譯介與馬華文壇中魯迅「苦悶-吶喊」之影現

從 1925 年及之後的幾年，帶有魯迅苦悶式的「吶喊」的創作才逐漸增多。我們以廣被認為受郭沫若影響的拓哥（生卒年不詳）〈赤道上吶喊〉為例，即可從其題名中隱約看到魯迅的影響：

> 現代的人生，只完全是**苦悶的象徵**，隨人、隨時、隨地、隨事，都只是不得已而已，不得不然而然，乾燥無味，沒有一點樂趣可言。尤以在作嚴峻的自我分析，自我責楚之稍有覺悟，稍有知識的青年與人士。
>
> 社會太險惡了；醜惡的勢力太緊張了！
>
> 自殺的念頭，遁世的思想，怎得不隨之迸出！
>
> 拿酒食等自戕其身體，被煩悶征服而甘心頹廢誰謂無由？
>
> 可憐一般自命為關心世道的冒牌學者，還不惜常加之以詆毀冷笑！
>
> 可憐的人喲；你終歸是想把象鼻穿過針眼罷了！
>
> 不能做個所謂的「糾糾的人生之戰士」，不能忍受目前的貧賤之苦；而又貪怕死，苟延殘喘，肉體上不能賣淫在作思想上的賣淫，滔滔皆是。
>
> 看！有人在向其卑躬屈膝了！
>
> 現世界弄成這個樣子，是現世界上人類的不幸；然而試把「自作孽」的意是（思）我（？）廣大來說，也還一定怪不到現世界以外去的。
>
> 一個男子有一個妻子不滿足，也就還有別的女人情願去滿足他，而原來的妻子也還不 知道「引咎自退」。
>
> 明知道娼妓不是人的正常生活，又依然穿好衣服搽好粉，點上胭脂戴上花，格外裝出 人的樣子去做娼妓。
>
> 果果相因；因因相襲。
>
> 舉凡現世界上的事，都可以由此類推，不分粗細大小，不問東西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

————唉；還有什麼可說了！[57]

作者所發出的「苦悶式吶喊」顯然針對當時馬華移民社會的腐朽，詩中提及「苦悶的象徵」一下子讓人想起魯迅所翻譯的廚川白村的著作，但文中接下來直接提及的卻是郭沫若與創造社。[58]文章亦直接提到，「郭沫若在『我們的文學新運動』上說得何等中肯而且痛快！」、「我們的現狀教我們宜不染於污泥，遁隱山林，與自然為友而作人生之逃避者。我們的精神不許我們退攖，我們的精神叫我們徹底奮鬥，做個糾糾的人生之戰士與醜惡的社會交綏。」[59]文中甚至言明「參見創造週報第三號」，更清楚言明郭沫若的影響。

「人生好像是不得已似的！
不得已相親
不得已相愛
不得已周旋
不得已談笑
我們不過是一群可憐的戲子罷！
枯燥的戲幾時才得演完」
大權在握；演這幕「枯燥的戲」，既然仍是我們這「一群可憐的戲子」，「幾時才得演完」，是不是仍只有由我來敲鑼擊鼓，**吶喊搖旗**，大開台，大掃台，讓我們自己來 回答？
苦悶的朋友們：我們的自作孽也作殼了！
悲壯的人們喲！我們不能叫人在神經的思想上賣淫！
與其不怕孤單，寂寥，躑躅荒榛古道。
既然什麼也可以丟開，一切也甘心撇掉。

57 拓哥，〈赤道上的吶喊〉，《新國民日報》第 15 版（副刊「南風」第 2 期），1925 年 7 月 29 日。

58 早期郭沫若與創造社也受到廚川白村的影響，可見羅振亞，〈廚川白村的現代中國詩界旅行〉，《文藝爭鳴》2021 年第 4 期，頁 33。

59 拓哥，〈赤道上的吶喊〉，《新國民日報》第 15 版（副刊「南風」第 2 期），1925 年 7 月 29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罷！請與我來攜手要叫我們的前線湊出一番豪壯的熱鬧。[60]

文章如郭沫若詩風那樣既直露又宣洩，但我們不能否定又隱隱然夾雜著魯迅式的「吶喊搖旗」影子。如上所述，魯迅的「搖旗吶喊」在主流的想像（當時的馬華文壇）中，是一種衝鋒陷陣的姿態，欠缺魯迅原有的猶豫內蘊。刊登此文的《南風》刊物創辦於 1925 年，一般認為它是馬來亞文壇第一份純白話文刊物。[61]對於拓哥這一篇〈赤道裏的吶喊〉，苗秀認為是馬來亞文壇第一次敢於面對人生、醜惡戰鬥的作品，敢於向沉悶的馬華文壇發出號角，[62]這自然不能不讓人想起魯迅式吶喊的隱形影響。苗秀也指出拓哥整體作品有創造社的深切影子，[63]一些詩作具有頹廢的情趣，[64]他認為這可能是時間上接近創造社創立，因而年輕人受其影響。[65]然而，更值得我們追問的是，文中一再重複「苦悶的象徵」究竟資源來自何處？有趣的是，在前面引述的評論以及下文將提及的各文論中，我們將看到有關廚川白村的文字亦常夾雜其中，作者們相當喜歡以廚川白村文學觀作為文學判斷的標準。從這裡或可讓我們窺視到魯迅在馬來亞另一層面的影響。

眾所周知，日本文藝理論家廚川白村以《苦悶的象徵》為代表的文藝論著自「五四」以來被介紹到中國，對中國新文學產生不應忽視的影響。實際上，中國 1920、1930 年代的幾十部文學理論著作都會援引廚川白村理論，例如田漢的《文學概論》、許欽文的《文學的概論》、君健的《文學的理論與實際》、章希之的《文學概論》等，表明了廚川白村對中國文學界的深切影響。同時，當時的通俗雜誌《禮拜六》還特別設計了「青年苦悶號」專輯，充分反映了此一「苦悶」意識之流行。[66]《苦悶的象徵》是廚川白村的遺作，該書及其內在各篇章一經面世，即引發中國學人的密切關注，明權（孔昭綬，1876-1929）、豐子愷（1898-1975）、魯迅、樊仲雲（1901-1990）等先後翻譯了單篇或全本，但其中以魯迅譯本最受重視。除了因為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逐漸積

60 同上註。

61 苗秀，《馬華文學史話》，頁 68。

62 同上註，頁 69。

63 同上註，頁 75。

64 同上註，頁 83。

65 同上註，頁 87。

66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頁 125-126；王向遠，〈廚川白村與中國現代文藝理論〉，《文藝理論研究》1998 年第 2 期，頁 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累的盛名，以及他本人的大力推介外，還與魯迅將《苦悶的象徵》作為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授課講義有關。[67]魯迅在北京大學授課，始於 1920 年底（是年 8 月 6 日接到聘書，12 月 24 日正式開始授課），直至 1926 年 8 月離開北京為止，期間「先是自編講義，講授《中國小說史略》，後又以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為教材，講授文藝理論」。[68]因此，可以推測馬華文壇多引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或許亦來自於魯迅的影響。

比如，《南洋商報》曾刊登一篇署名汪鴻勳[69]的評論，作者特別介紹了廚川白村的人生哲學。作者直言對於廚川白村「沒有什麼多大的認識，但是他的書，我已讀過幾種……**我們從魯迅先生的話裡**，可以知道，廚川博士……」，可見魯迅的痕跡。作者在文中主要介紹了廚川白村的人生哲學，指出他的人生哲學「乃是以大無畏的精神，而建築在一堅強之基礎上，大約可以用（一）凱子論和（二）肯定論來解釋」。[70]所謂「凱子論」，基本上就是指社會的推動來自於「凱子」，他們是「改造的人，先覺的人，為人類而奮鬥……」。「肯定論」則是意指人生是不完整的，有黑暗、罪惡等，但「……正因為有生的苦悶，也因為有戰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因為缺陷，所以有發達，惟其有惡，而善才可貴，倘沒有善和惡的衝突，又怎麼會的有進化，怎麼會有向上呢？」。[71]最後作者指出，廚川白村不滿意日本人基本都恍恍惚惚，有小手段，沒有充實的內在生活，缺乏深刻反省，全非像是人的影子，對生命之人生熱度不足。語風一轉，作者又再一次引述了魯迅的話說，「不怪魯迅也說，『簡直』可以疑心是說著中國」，「診斷以後開出一點藥方，則在同病的中國，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們的參考或服用」。[72]簡言之，此文討論廚川白村的人生哲學兩次引用了魯迅，顯然表明魯迅譯介的「苦悶的哲學」在南洋文壇有了傳播的可能性。同時，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編者轉載此文，似乎透露

67 鮑國華，〈作為講義的《苦悶的象徵》〉，《新文學史料》2019 年第 4 期，頁 87。

68 同上註。

69 據查，汪鴻勛可能就是汪銘竹（1907-?），江蘇南京，肄業於中央大學。1934 年，在南京與常任俠、孫望等組織土星筆會，編輯《詩帆》半月刊，並發表作品。抗戰時在《楓林文藝》、《中國詩藝》、《文藝先鋒》、《文藝青年》等刊發表作品。見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 404。

70 汪鴻勳，〈廚川白村的人生哲學（一）〉，《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7 年 8 月 16 日。

71 汪鴻勳，〈廚川白村的人生哲學（二）〉，《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7 年 8 月 17 日。

72 汪鴻勳，〈廚川白村的人生哲學（三）〉，《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7 年 8 月 1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編者的某些意圖，即可能具有某種時代與南洋情境的針對性。

如上所述，前述署名超民的作者在一篇評論近代中國文學思潮時也一樣引述廚川白村的言論。實際上，他在另一篇評論〈近代文學與文學批評〉盛讚魯迅的〈阿 Q 正傳〉、〈祝福〉及冰心的〈超人〉描寫峭刻，寓意深遠，「正可說入木三分」、「無懈可擊」，但一般讀者常不能理解其中意義，作者故又再引述廚川白村的話「文藝家做那憑著表現的創作，而讀者則做憑著喚起的創作」，[73]「賞味詩歌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就已經是詩人，是歌人了，因為是度著和作家一樣的創造創作的生活」，[74]以說明馬華文學需要評論家。超民在此處所引《苦悶的象徵》原文同樣完全出自魯迅譯本，[75]已再一次深切說明了魯迅的影響。

另一位文學評論作者靈谷在其〈從人的生活說到文藝〉裡，同樣引述了魯迅譯本中有關廚川白村說法，「生的歡喜 Joy of Life 的事，就在這個性的表現，在創造創作的生活裡可以尋到」。[76]靈谷指出，文學家若一直記得功效、或如何讓社會注意到，所謂「生的歡喜」將永遠無法達致，因為這是文藝喪失其本性的結果。作者以兒童遊樂而被遏制為例，指出他們將會因此掃興而憂鬱，因為「苦悶的散發，就是快樂的尋求」。作者認為，人之所以能持續的活躍，社會之所以可以能長存不滅，和一切的向上發展，正因為這一強烈心情的存在使然，這就是廚川白村所謂的「生命力也即是人的內的生活，發作出來的種種不同的表現，就是一種個性的表象」。[77]因此「個人的生活是文藝的本質，社會生活是文藝的附助」，但「許多文藝家把這一點誤解了，倒把社會生活當著文藝的本質，使文藝進了個黑暗的時代，批評家亦誤用了社會學的觀點去批評，文藝於是乎可以宣傳主義，詩也可以在概念中發出。」[78]他以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為例，指作家寫《玩偶的家庭》，只是出於他內心生活的要求，「但是他作品上所以能夠給人許多偉大的社會思想的發見，便是為了文藝家本身的內的生活，在不斷進展中，和社會生活的凝滯起了衝突，這個衝突使他內心種下許多感觸，而強烈的個性，一經發表出來，不止

73 超民，〈近代文學與文學批評（十一）〉，《南洋商報》第 24 版，1928 年 6 月 14 日。
74 超民，〈近代文學與文學批評（十二）〉，《南洋商報》第 24 版，1928 年 6 月 15 日。
75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徵》，頁 66。
76 靈谷，〈從人的生活說到文藝（一）〉，《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5 月 5 日。見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徵》，頁 10。
77 靈谷，〈從人的生活說到文藝（二）〉，《南洋商報》第 22 版，1928 年 5 月 7 日。
78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給以人類巨大的理智，就其精神也確是偉大的。」[79]作者認為，真的文藝、偉大的文藝是內在生活欲求的極端自由之表現，但內在生活卻時時反抗著社會生活，而內在生活因為受了有限的外在生活壓制，悲哀的成分較多。當內在生活悒積了悲哀，作家的創作欲求變成強烈而迫切，而經過創作的生活之後內心才會暢適，因此文藝的目的是發散自己的苦悶。[80]「我們要知道文藝既出自個人內的生活的欲求，從生命的力中飛躍出時，那我們決不能就說它無關著人類社會，不是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我們須明瞭個人就是社會中的一個，在某個社會裡頭的文藝家，因了外的生活壓來（力？）和內的生活的反抗，其個性上、生命力飛躍出的作品，自自然然帶著某個時代、某個社會精神……。」[81]因此他認為，具有時代精神的作品，自然其時代暗示力必不少，其社會影響自然一想可知，這就是「人生的藝術」，並不是虛幻的藝術。最後作者以文藝的口氣呼籲：

> 有志文藝的青年們啊，
> 我們排除一切舊有的陳套，我們樹起新文藝的旗幟，
> 我們在營內的生活的人，對外的生活的阻壓，當高呼「勇者不懼」，以身供之，
> 前面的曙光，已經開始隱約，我們的苦悶，到了極巔，
> 我們燦爛偉大時期，不久將到。[82]

作者所引述的廚川白村文藝觀基本亦來自魯迅的譯本與闡釋。廚川白村將文學創作活動定義為一種嚴肅、重要、屬於人的生命存在、本真意義上的活動，同時崇尚生命的「力」的美，以為文學正是反對平庸的功利生活，這些都是魯迅特別著重的。[83]靈谷此文寫於 1928 年，當時中國大陸已經出現文學階級化趨勢，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個「反抗」的態勢，作者借廚川白村的「文學來自內生活」，來抵制「文學來自政治」。此文另一個明顯訊息是作者所說的：「我們

79 靈谷，〈從人的生活說到文藝（三）〉，《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5 月 8 日。
80 靈谷，〈從人的生活說到文藝（四）〉，《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5 月 9 日。
81 靈谷，〈從人的生活說到文藝（五）〉，《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5 月 10 日。
82 同上註。
83 沈幼平，〈魯迅翻譯傳播《苦悶的象徵》心理動機研究〉，《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2 期（2013 年 3 月），頁 233-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苦悶，到了極巔」，也進一步透露了上文說提及的——編者的當下針對性——當時馬華文壇已出現的一股「苦悶」的氛圍。從早期報刊與文學著作中，我們不時也可以看到「苦悶」敘事的頻現，許多作者選擇以「傾訴」作為其寫作的最基本表達方式，並多以感傷為基調。

除了前面已引出的拓哥〈赤道上吶喊〉，我們可再舉「苦悶敘事」另一例。啟麟發表於《玫瑰》第三期的詩也仿照魯迅《吶喊》小說集之名，詩名取為〈吶喊〉：

何處傳來的啊這□呼聲？
是不是孤弩之末的嘵呻？
是不是失戀的噫欠嗚咽？
不是孤弩之末的嘵呻呀，
也不是失戀的噫欠嗚咽！

只不過是毅力者的吶喊，
□（嘯？）聚的吶喊聲中他咀咒著——
咀—酒囊飯袋的冷血死！
咒—殘□闊□的野心走狗！
□（嘯？）聚的吶喊中更□讚著——
□—站在戰線上的敢死隊！
讚—□（畢？）□（虎？）□（氵）□的□利勇士！

何處傳來的啊這□呼聲？
是不是孤弩之末的嘵呻？
是不是失戀的噫欠嗚咽？
不是孤弩之末的嘵呻呀，
也不是失戀的噫欠嗚咽！[84]

從詩歌名字到「苦悶式的吶喊」方式，都印證了王富仁所說的，作者們「從社會人生中感到了人生的苦悶、有著改良這人生的願望」，而借用了具魯迅寓意

84 啟麟，〈吶喊〉，《南洋時報》第14版（副刊「玫瑰」第3期），1927年10月14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文學形式。這種「苦悶式的吶喊」之敘事頗多，下文將再舉例說明，此處似乎表明這一苦悶氛圍與《苦悶的象徵》在馬來亞之傳播乃一體兩面，相互表裡，看來並非偶然。

實際上，中國新文學作家對文藝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廚川文藝發展史觀的影響，這包括有關文藝的進化觀念、主觀主義以及文學作為一種象徵的精神。[85]1924 年起，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觀在「五四」落潮時被翻譯到中國，與中國的現實處境十分吻合。「五四」落潮後，殘酷黑暗的社會現實無情粉碎了昂揚興奮的浪漫青年的五彩夢幻，黑暗現實使他們無法實現自己個性解放，狂飆突進墮入苦悶懊惱，此時感傷的文學成為文壇一時的風氣，廚川所提倡的「苦悶的象徵」說，無疑為中國新文學作家將文學作為抒發「苦悶」的工具找到了依據。[86]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從五四時期至五四退潮的 1920 年中後期之間，中國知識青年一代出現了對人生、價值等問題迷茫不定、求解無門的徬徨與虛無感，他們煩悶於戀愛、婚姻、家庭以及讀書、學校及出路等問題。[87]魯迅翻譯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後在譯後記中說，廚川白村對於日本缺點的猛烈攻擊是個「霹靂手」，並覺得廚川「狙擊的要害」也是「中國病痛的要害」。[88]可見「生命衝激力」與「煙囪掃除」的刺戟力對於魯迅以及其他中國五四文人一整個世代的影響。[89]但是，隨著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普羅文學」的到來，1927 年以後，「革命」話語逐漸沖擊、解構、替代長時間統治文壇的「苦悶」語境，「苦悶」文化語境的漸行漸遠，**作家們開始以「革命」對抗「苦悶」**，對廚川白村文論思想進行了清算性的質疑和解構，「廚川白村熱」在中國才開始走向式微。[90]然而極為弔詭的是，郭沫若依據廚川白村的理論在 1920 年代中後期發展出生命能量被壓抑，需要執行「煙囪掃除」的工作，而這不僅可以運用於文藝理論，以讓文人「吐瀉」出「不愉快的記憶」，更可以運用於社會與文化問題，並認為革命的爆發也不外是一種自然療

85 黃德誌，〈廚川白村與中國新文學〉，《文藝理論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47-50。

86 同上註，頁 49。

87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頁 130、152。

88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頁 128。

89 可詳見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第五章，劉氏有精彩的分析。

90 羅振亞，〈廚川白村的現代中國詩界旅行〉，頁 32、35；王向遠，〈廚川白村與中國現代文藝理論〉，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性的「煙囪掃除」。[91]易言之，從精神上對「苦悶」的「吐瀉」到「革命」，這之間有著「內在聯繫」。從這個角度來說，之後馬華社會在 1920 年代末期隨著大陸思潮走向「左翼」與階級鬥爭，似乎就有了有跡可循的思想軌跡了。有趣的是，馬華文壇也呈現這一趨勢。1930 年，作者荒此在〈文藝拉雜談〉即批判了廚川白村的文學主張，指出他的文學思想脫離現實，是超人的思想，對社會無益。作者表明，文學與其他藝術一樣，起源於社會生活，所以文學始終不能脫離社會生活。文學負有指導人生和改造社會的使命，而文學創作者必須克服環境所養成的習慣與思想行為，同時也應該丟掉自己的潔癖，學習大眾的言語及大眾化的表現手法。[92]與此同時，相反的，博夫則在〈文藝與生活〉堅持，文藝是人生的表現，表現作者解答人生問題與宇宙問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作者認為，好的文學作品表現了作者的生命力，若以什麼主義和派的觀念來要求文學，絕不會產生偉大的作品，只會出現淺薄的模仿品。[93]這些論述一方面反映了文風的轉變，另一方面也透露了時代思想之間的過渡。

然而，據苗秀《馬華文學史話》所述，馬華文壇於 1927 年至 1929 年仍出現不少「苦悶」書寫，包括性苦悶等，並沒有隨著中國之退潮而消退。這說明，這一苦悶現象的時間段與中國並不一致，它應該有南洋自身的語境，比如南洋文化的低沉、身在殖民地的低微地位等，而馬來亞報刊與作者引進廚川白村似乎也與這一語境有關。實際上，依據楊松年的研究，當時很多刊物的名稱都反映了南洋文化環境猶如枯島，如《枯島》、《荒島》、《浩澤》、《荒原》、《洪荒》、《混沌》與《沙漠田》等，[94]都表明了南洋自身的深沉的處境問題。

除此之外，1927 年《南洋商報》轉載了徐丹甫的〈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略批評魯迅。此文原載於 1927 年 6 月 4 日上海的《時事新報·學燈》，文中揭露了北京文藝界的狀況，其中提到陳西瀅針對陳大悲戲劇翻譯的批評是「北京文藝界分門別戶之導火線」，「結果是孫伏園先生飄然引去，另辦京報

91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頁 140。

92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報刊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頁 152。原文見荒此，〈文藝拉雜談〉，《星洲日報》（副刊「野葩」第 20 期），1930 年 6 月 5 日。

93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報刊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頁 152。原文見博夫，〈文藝與生活〉，《星洲日報》（副刊「野葩」第 18 期），1930 年 5 月 21 日。

94 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1），頁 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副刊，周氏兄弟也隨之脫離（與）《晨報》（的）關係。《晨報》社改聘了徐志摩先生為副刊編輯。文藝界的門戶之爭，從此開始」。[95]此文作者徐丹甫即梁實秋（1903-1987），魯迅在〈略談香港〉中說：「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循環世界》裡，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顯然魯迅看到的是香港《循環日報》的轉載，他當時並不知道「徐丹甫」是梁實秋的筆名，[96]此文被認為是魯迅與梁實秋論戰的源頭。文中，梁實秋批評「魯迅先生是小說家及雜感家，他的個性真充足。〈阿 Q 正傳〉據說已有好幾種譯本，其價值可知。魯迅先生的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除此別無可稱。但是欽仰魯迅先生的小說的人極多，魯迅先生又極力獎掖後進，所以也有很大的勢力。」[97]所謂「魯迅先生的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除此別無可稱」，毫不掩飾作者對魯迅的貶意，但無礙於南洋報刊的轉載，說明魯迅在馬華文壇是不具權威性的。

以上所述揭櫫了在 1920 年代的馬華文壇中，魯迅雖已被當著新文學典範，但似沒有居於主導地位。魯迅被接受的維度首先是，這個時期其小說顯然比較受到關注；其次，與同個時期大陸的魯迅形象接近，都以「人生-藝術」為基礎；其三，魯迅對廚川白村的翻譯與理論推介帶來了影響，而恰好呼應了馬華文壇的苦悶氛圍。顯然，魯迅也並非方修、章翰等人筆下那樣的空白，但也不是從一開始就是馬華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一面現實主義旗幟。相反的，那是一個複雜的、多元並存的魯迅，而且也是一個遲來的魯迅。在臺灣，1925 年 1 月 1 日《臺灣民報》已對魯迅及其作品做轉載介紹，然而新馬文壇顯然缺乏對魯迅做系統引介。一般認為，蔡孝乾發表於《臺灣民報》的〈中國新文學概觀〉（第 3 卷 12-17 號，1925 年 4 月 21 日 - 6 月 11 日）中關於魯迅《吶喊》的評述文字，是臺灣第一次出現關於魯迅的評論，成為臺灣「魯迅傳統」建構的先聲。[98]臺灣也如此晚才有魯迅評論，如此相較之，馬華文壇於 1923 年才出現有關魯迅評論，也就不出奇了。

95 徐丹甫，〈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二）〉、〈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三）〉，《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7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此文原載於上海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7 年 6 月 4 日。

96 邱煥星，〈「徐丹甫」即梁實秋——2005 版《魯迅全集》的一則註釋問題〉，《魯迅研究月刊》2010 年第 9 期，頁 88-90。

97 徐丹甫，〈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二）〉，《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7 年 8 月 31 日。

98 徐紀陽，〈「魯迅傳統」的對接與錯位——論光復初期魯迅在臺傳播的若干文化問題〉，頁 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作為五四新文學一部分的「馬來亞魯迅」

上文已初步揭示了魯迅在 1920 年代的馬來亞華文文壇的形象是相對複雜、多元並現的，但更準確的說，魯迅在當時馬華文壇的流傳與影響其實是「五四新文學」的一部分。我們有必要再略為勾勒 1920 年代的馬華文壇語境與生態，才能更清楚理解魯迅在其中的位置。方修、章翰等人所謂魯迅在 1920 年代即已重要，其實也值得我們再加以檢視。

在社會文化上，與前述《南風》同時被方修譽為是馬華新文學運動起源的刊物是《叻報》副刊〈星光〉。[99]《星光》亦創刊於 1925 年，其論述其實更符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整體觀念，是更具代表性的馬華「五四」推介者。它主張五四的白話文改革以及重估一切價值，顯然傾向於五四的自由主義立場。整體來看，它似接受了五四運動中胡適自由主義及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之人道主義」之影響，《星光》於第四期還登載了胡適演講詞〈科學方法與整理國故〉，因此被批評為對傳統態度過於妥協。[100]苗秀即批評該刊物所聲明的「本刊態度取和平感化、戒過激謾罵」的立場。[101]此外，它亦並非一個純文藝刊物，其所涉及範圍更廣，包括主張教育改良、女子教育、介紹科學常識，也刊登一些唱酬的舊詩詞。[102]方修則認為，即便刊物聲明「本刊態度取和平感化、戒過激謾罵」，但刊物的態度是很積極的，他們討論了文學問題、也挑戰傳統的教育制度，是一種新思想、新理論的闡揚，「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若《南風》是新文學運動的先遣部隊，而星光則是正式誓師了。[103]

《星光》首任主編譚雲山（1898-1983）於 1924 年南來，在中國時即已受五四運動之影響，根據他的妻子陳永仁的說法，他南來前參加過「搖旗吶喊」的工作，而「搖旗吶喊」正是譚雲山特別喜歡說的話。[104]正如前文已提過的，段南奎於 1926 年發表的、具魯迅「吶喊」影子的文章——「只不過在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願寂寞，忍不住的吶喊幾聲『光明！光明！』」——也正是在此刊物上發表。在文章中，作為後來繼任編者的段南奎提出了類似五四的改革號角，他如此形容南洋社會：「是陳腐的、墮落的、靜

99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頁 3。
100 苗秀，《馬華文學史話》，頁 88。
101 同上註，頁 88-89。
102 同上註，頁 90。
103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頁 57。
104 同上註，頁 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止的、停滯的、臃腫的、麻木不仁的，半身不遂的病社會」，[105]這段引文一下子讓人想起五四運動健將們當時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絕對性形容，與陳獨秀（1879-1942）的言論極為相近：「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106]因此，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文中段南奎接下來會說，「今而後，我們願本著評判的態度，來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價值」；[107]另一位編者鄒子孟也說，「今後本刊的態度，是把南洋的社會，重新估定」，[108]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正是五四運動響徹雲霄的口號。這表明，在《星光》刊物中，魯迅是作為五四的一部分而被引述的。

值得我們注意的，相對於魯迅，有關胡適的篇章轉載或評論似乎更多，比如《南洋商報》於 1924 年 7 月 21 日刊登了趙余勳所寫的〈讀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篇〉、[109]上述遲至 1922 年 6 月 29 至 7 月 17 才刊登於《新國民日報》的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等。有關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雜感似乎未見轉載，這可能因為魯迅畢竟不是中國五四新思想啟蒙的發難者。此外，上述五四時期新文學第一個社團「文學研究會」影響的軌跡更加鮮明，因此多有冰心的踪影，如 1922 年 8 月 4 日《新國民日報》轉載了冰心的〈論「文學批評」〉，1923 年冰心赴美求學也獲得報刊的報導，將之形容「為新時代中富有文學天才之青年作家，為國人之讀其作品者，仰若明星……」。[110]《新國民日報》於 1921 年 9 月 30 日刊登了五四人物劉半農（1891-1934）的〈新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等。1922 年，泰戈爾的思想亦被引介到馬華社會，「叻報俱樂部」已經刊載了〈泰戈爾的女性觀〉，這說明當時馬華文壇更加注重新思想之傳播，[111]同時也看到「文學研究會」的影響。[112]譚雲山南

105 段南奎，〈本刊今後的態度〉，《叻報》（副刊「星光」第 46 期），1926 年 4 月 20 日。

106 陳獨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7 卷 1 號，1919 年 12 月 1 日。

107 段南奎，〈本刊今後的態度〉，《叻報》（副刊「星光」第 46 期），1926 年 4 月 20 日。

108 鄒子孟，〈再向讀者說幾句話〉，《叻報》（副刊「星光」第 75 期），1926 年 8 月 7 日。

109 趙余勳，〈讀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篇〉，《南洋商報》第 4 版，1924 年 7 月 21 日。

110 南洋報社，〈謝冰心女士赴美求學了〉，《南洋商報》第 11 版，1923 年 9 月 21 日。

111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頁 8。

112 泰戈爾於 1924 年訪華途中曾路經馬來亞，受到華人社會的熱烈歡迎。從當時報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前亦是「文學研究會」會員，[113]這可側見「文學研究會」的影響。譚雲山非常喜歡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當 1924 年泰戈爾訪華路過新加坡時，[114]他也熱忱接待，也因此後來被泰戈爾所賞識，被延攬至印度國際大學任職。提及「文學研究會」，必須注意的是，問題小說也成為 1920 年代初期馬華文壇最重要的文類，這自有其馬華社會本身情境之需求。比如《育群報》就於 1919 年 8 月 15 日「新小說」欄目裡刊出徵稿要求，特別以楊振聲的問題小說〈一個兵的家〉為例，要求讀者以之為範本。《新國民日報》也十分重視問題小說，多有轉載《新青年》的問題小說，這形成了馬華文壇的「期待視野」。[115] 1925 年以前，報刊轉載的篇章所來自的中國期刊似乎傾向於「文學研究會」的刊物如《小說月刊》，方修也說過 1919 至 1925 年所謂的馬華新文學萌芽期中，「接受了五四初期中國的文學研究會葉紹鈞、茅盾、鄭振鐸這一群人的文學思想」。[116]這實際上更進一步論證了，南洋的「五四魯迅」可說夾雜於「為人生而文學」氛圍中，而很明顯「為人生而文學」正是一個重要思想趨勢，而且作家多元並置。

然而有趣的是，1925 年以後，我們可以看到馬華文壇顯現了某些新動向，即創造社的影響開始浮現，上述《南風》可謂是其代表，只是作者僅拓哥一人。前述提及拓哥的〈赤道裏的吶喊〉就是發表與此刊物。然而從當時的刊物來看，1927 年至 1929 年間一股洋溢著傷感的浪漫主義趨勢變成越明顯，比如刊於《綠漪》的何采菽小說也被認為「……洋溢著傷感的浪漫主義的氣息，那氣質是頗近於創造社的郁達夫，作風也極其相似。他的小說內容，經常寫的是個人身邊瑣事，富於自敘體性質，表現著濃烈的抒情意味」。[117]此外，論

副刊為歡迎泰戈爾而刊載的各種有關泰戈爾譯文及評論，顯然可見「文學研究會」刊物如《小說月報》的影響。見許德發，〈一九二零年代泰戈爾來訪與馬來亞華人的社會反響——兼論馬華文化與文學的「前左翼」場域〉，張錦忠、魏月萍編，《亞際南方——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離散/現代性研究室，2022），頁 141-180。

113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頁 227。

114 有關泰戈爾路徑馬來亞的盛況可參見拙作，許德發，〈一九二零年代泰戈爾來訪與馬來亞華人的社會反響——兼論馬華文化與文學的「前左翼」場域〉，張錦忠、魏月萍編，《亞際南方——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頁 141-180。

115 黃佩晶，〈馬華問題小說的五四淵源與其反封建精神——以女子、婚戀問題為中心〉，《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3 期（2020 年 9 月），頁 57-82。

116 方修，《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1970），頁 2。

117 苗秀，《馬華文學史話》，頁 1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述郁達夫小說亦頗可見及，譬如靈谷寫了〈郁達夫的小說〉。[118]有關苦悶為題的論述或作品，非常多，散見於各個刊物上，比如倩影〈關於《現代女性的苦悶問題》的幾句話〉。[119]再如 1927 年至 1928 年出版的《荒島》刊物上，就出現不少以「苦悶」為題的寫作，[120]《洪荒》亦涉及異鄉人的苦悶與個人落寞的書寫，[121] 而且不少借用魯迅「吶喊」來抒發苦悶。《荒島》上甚至出現不少性苦悶的作品，如法雨的〈童心〉、〈獨身者〉以及詩梟的〈苦悶〉等，明顯受到郁達夫《沉淪》的影響。[122]評論者鄭文通亦針對當時的副刊「瀑布」的作者評說，「他們在作品上俱表現出狂熱的態度，想從形式嚴格的束縛中突圍而出，放步邁進，徹底闡發時代的要求；而結果因環境的控制，使他們全陷於徬徨而感無所適從的苦悶，因而被人認是為藝術而藝術，放不出膽量提供人類的悲戚的呼聲。」[123]「瀑布」是 1928 年 12 月 17 日附於《新國民日報》的副刊，停刊於約 1931 年，前後維持兩三年。[124]

必須注意的是，過去的研究者輕易的將這些現象直接與創造社等同起來，[125]而忽略了與魯迅的關係，即**魯迅對廚川白村譯介之關聯與影響，更忽略了魯迅式「吶喊」的實質**。實際上，主觀化和抒情性是「五四」作家們共同的文化基因與時代印記 ，這也包括了魯迅的作品。普實克說過：「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充滿著憂鬱的主觀主義色彩。」[126]沈從文的〈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也曾論及，自 1920 年以來魯迅散文作品就代表「艱苦鬥士的作戰」傾向，有純抒情的一面，亦有感慨沉痛的一面。[127]魯迅短篇小說中所蘊含的執著而濃烈的生命激情，在強度上亦決不亞於「狂飆突

118 靈谷，〈郁達夫的小說〉，《南洋時報》第 13 版（副刊「綠洲」第 127 期），1928 年 1 月 14 日。

119 倩影，〈關於《現代女性的苦悶問題》的幾句話〉，《荔》第 40 期，1928 年 1 月 6 日；見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頁 115。

120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報刊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頁 92-136。

121 同上註，頁 19、73。

122 同上註，頁 104-105。

123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頁 90。

124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報刊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頁 3。

125 如上文提及的苗秀相關評論。

126 轉引自李麗，〈論「抒情」的介入與「五四 」短篇小說的形式革新〉，《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 期，頁 124。

127 沈從文，〈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9），第 16 卷，頁 259-2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進」的郭沫若們，只是他沒有以直瀉的方式傾倒出來，而是以含蓄、低徊的抒情表達了出來。[128]學者已指出，魯迅與創造社「苦悶」之不同，在於創造社沒有如魯迅在辛亥革命之後所體驗的「苦悶」那樣，充滿猶豫、壓抑，因此郭沫若諸人很快就通過馬克思主義、工農運動與俄國十月革命之中尋找到「新的理想寄託」。[129]顯然，我們不能忽略**魯迅「吶喊」及其散文作品的影響，尤其它與魯迅所譯介的《苦悶的象徵》之興起是合流的，所以造成了一種複雜的、相互融合的影響**。但有趣的是，新馬魯迅模倣者的文學表現，顯然不太看得出「魯迅特質」，**魯迅的「吶喊」和郭沫若式的「呼喊」、魯迅的「苦悶」和郁達夫式的「自憐」，他們之間的「抒情性」在模仿者身上是不見得能看出明顯區別的。在革命文學到來之前，馬華青年文人強烈感受到的是，似乎是其中的共同成份——苦悶與主觀抒情。**然而，猶如前述，1930 年已開始出現批評廚川白村的文學觀，在作品上也相應地開始體現了告別苦悶與吶喊的現象。以 1930 年的《文藝工廠》刊物為例，不少詩作出現了一種方向，即先表露極度苦悶與徬徨，最後由低沉而高漲，充滿了「叫喊」，目的在於喚起人們的積極向上。[130]同時，亦有趨於「口號式的吶喊」毛病，如《野葩》。[131]這透露了所謂革命文學——馬華「新興文學」——即將到來。

概括言之，依據楊松年對 1927 至 1930 年轉折時期之間的報刊副刊研究，他認為此一時期絕大部分詩作是個人抒情的，而散文方面，也以抒情與議論為主，而抒情作品中多為懷念感時的抒情文字，而且多喜歡書信體或日記體。至於小說，則一般可分為宣揚革命小說、婦女問題、愛情與社會教育問題。[132]這其實仍與五四的主流文學相近似，再一次說明馬華文學的「五四時期」與中國整體五四文學的關聯，而魯迅即在這一南洋的「五四語境」中多元並現，有著或現或隱的作用。

五、餘論：思想轉折與「五四魯迅」的退場

如上所述，過去的研究多以 1930 年「陵」對魯迅的批評說明魯迅在新馬

128 李麗，〈論「抒情」的介入與「五四」短篇小說的形式革新〉，頁 124。

129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頁 195。

130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報刊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頁 170-171。參見流水，〈我徘徊於寂寞微涼底荒郊〉，《文藝工廠》第 1 卷第 3 期，1930 年 9 月 20 日。

131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報刊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頁 153。

132 同上註，頁 24-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位的轉折，或是「左翼魯迅 」傳統起始的前夕。但實際上，1928 年當創造社批評魯迅時，或者說，在 1928 年中國「革命文學」依始，很快的，一位署名「逸郎」的作者即已撰文，以自我嘲諷的口氣自稱自己寫的是閒文，語風一轉就批評起魯迅：

> 魯迅先生雖然因喜和人鬧氣，以致「言論權威者」及「思想先驅者」一變而為「土匪」、「學棍」令人「可惜」。然在我看來，「土匪」、「學棍」有何「可惜」；真「可惜」的，乃是把「佛郎」或「馬克」所換來的什麼士，和從「公理」「流言」所得到的什麼長。[133]

作者接著自述「自從去年革命勢力膨脹到滬上，一時請嗤結會的風大盛，我卻沒論那一回，同學促我蒞宴或入會，總是『卻之大吉』，因我疑心他們將在演『關係』的勾當」，「今年來到南洋，雖曾給幾位朋友促了幾促，用過了幾會晚膳。……後來卻聽見：『某教員是某總理的契子，某董事是某教員的『義兄』。於是，我便佩服南洋的中國人，比較中國的中國人更聰明。如給魯迅先生聽了，他老人家或又要『笑脫了牙』，弄成大事。」[134]文中作者自稱於 1928 年南來，可見南來文人開始將此風氣帶到南洋。1930 年，也有一位叫「甲辰生」寫了一篇〈魯迅賣狗皮膏藥〉，對魯迅嘲諷極盡能事。[135]當時的馬華文壇也注意到魯迅在上海文壇的狀況，也委婉的批評魯迅「落後」。一位作者許由在一篇題為〈一九二九年之中國文壇〉中，批評《新月月報》表現著資產階級立場，但「《奔流》、《語絲》、《北新》這三種什誌是在魯迅影響之下，也就表現著願意接近普羅階級的意志，同時逗遛不前、意存觀望，形成了站在中間不能自決的猶豫態度，《語絲》、《北新》二什誌到了年末因為《北新》老闆與魯迅衝突，由李少峯自編，脫離魯迅的支配，表現著向前的態度，並且探望普羅作家的作品了」。最後文章總結說，1929 年這一年的中國文壇形勢上說是左傾，狀況上說是比較沉寂。[136]這意味從 1928 年至 1930 年的兩年間，整體馬華文學風氣開始變化，而魯迅在這裡頭常成為被批評的對象，

133 逸郎，〈閒文〉，《南洋商報》第 13 版，1928 年 1 月 20 日。

134 同上註。

135 甲辰生，〈魯迅賣狗皮膏藥〉，《南洋商報》第 20 版，1930 年 4 月 29 日。

136 許由，〈一九二九年之中國文壇（一、二）〉，《南洋商報》第 20 版，1930 年 3 月 20-2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魯迅在馬華文壇中的形象也在轉折之中。

綜合而論，「五四魯迅」主要以其小說及其對廚川白村的譯介影響了 1920 年代的馬華文壇，但那是一個整體五四新文化傳播的一部分，而魯迅作為五四的一部分，對其評價雖高，但沒有權威、只有多元並置，甚至有些變調，更亦非單純地僅具「左翼魯迅」研究所強調的現實主義形象。他的小說與人生「苦悶式吶喊」及廚川白村的譯介，其實在馬華文壇剛起步的階段中，只能是一道脆弱的思想存在。因此，在 1928 年發生了左翼思想興起的轉向之後，隨此轉化的，是魯迅後期雜文被注意，它帶來的是「社會批評」之影響，因它能更好地結合了左翼思想。從 1928 年之後，「五四魯迅」逐漸淡出馬華文壇，這也意味著「為人生的五四」與「為人生-藝術的魯迅」似乎找不到發表其言論的空間而失聲，成為馬華文學史上的「低音」。至於精英階層的英美派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一開始就基本缺席於馬華文壇，因此從魯迅逝世開始，當中國共產黨把對魯迅進行詮釋的話語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之時，以中共新民主主義為主導的左翼話語長驅直入馬華文壇，整個脆弱的「五四魯迅」低音很快就被掩蓋了。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在 1930 年代「左翼魯迅」大潮下，「五四魯迅」雖被忽略，但不代表它是完全不存在的，它在 1930 年代以降是否仍持續存在、是否「執拗」著，也有待我們「重訪」，以豐富我們對歷史的了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1962。

———，《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1970。

———，〈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7，頁 39-47。

———，〈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7，頁 48-53。

王向遠，〈廚川白村與中國現代文藝理論〉，《文藝理論研究》1998 年第 2 期，頁 39-45。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聯書店，2014。

———，〈「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的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頁 113-164。

王富仁，《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王瑜瑛，〈馬華文學界的魯迅觀〉，《社會科學戰線》1995 年第 3 期，頁 211-214。

王潤華，〈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7，頁 123-144。

天放，〈瘋子的日記〉，《南洋商報》第 13 版（副刊「洪荒」），1927 年 8 月 18 日、8 月 25 日、9 月 1 日。

甲辰生，〈魯迅賣狗皮膏藥〉，《南洋商報》第 20 版，1930 年 4 月 29 日。

朱文琦，〈魯迅《吶喊》中移出〈不周山〉的原因探究〉，《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19 年第 1 期，頁 64-67、74。

李麗，〈論「抒情」的介入與「五四 」短篇小說的形式革新〉，《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1 第 2 期，頁 116-126、1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汪衛東，〈何謂「吃人」？——《狂人日記》新讀〉，《國際魯迅研究》第 1 輯，2013 年 8 月，頁 11-43。

汪鴻勳，〈廚川白村的人生哲學（一、二、三）〉，《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7 年 8 月 16 日、17 日、18 日。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9。

沈幼平，〈魯迅翻譯傳播《苦悶的象徵》心理動機研究〉，《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2 期，2013 年 3 月，頁 229-234。

拓哥，〈赤道上的吶喊〉，《新國民日報》第 15 版（副刊「南風」第 2 期），1925 年 7 月 29 日。

邱煥星，〈「徐丹甫」即梁實秋——2005 版《魯迅全集》的一則註釋問題〉，《魯迅研究月刊》2010 年第 9 期，2010 年，頁 88-90。

段南奎，〈本刊今後的態度〉，《叻報》（副刊「星光」第 46 期），1926 年 4 月 20 日。

苗秀，《馬華文學史話》，新加坡：青年書局，1968。

南洋報社，〈廈大新聘教員將到校〉，《南洋商報》第 10 版，1926 年 10 月 13 日。

———，〈謝冰心女士赴美求學了〉，《南洋商報》第 11 版，1923 年 9 月 21 日。

南治國，〈寂寞的魯迅——魯迅與二十年代的馬華文壇〉，《魯迅研究月刊》2002 年第 6 期，頁 46-50。

———，〈魯迅在新馬的影響〉，《華文文學》2013 年第 5 期，頁 72-77。

禹權恒，《上海魯迅——形象建構與多維透視（1927-193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流水，〈我徘徊於寂寞微涼底荒郊〉，《文藝工廠》第 1 卷第 3 期，1930 年 9 月 20 日。

倩影，〈關於《現代女性的苦悶問題》的幾句話〉，《荔》第 40 期，1928 年 1 月 6 日。

荒此，〈文藝拉雜談〉，《星洲日報》（副刊「野葩」第 20 期），1930 年 6 月 5 日。

陵，〈文藝的方向〉，《星洲日報》第 19 版（副刊「野葩」第 9 期），1930 年 3 月 19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啟麟，〈吶喊〉，《南洋時報》第 14 版（副刊「玫瑰」第 3 期），1927 年 10 月 14 日。

郁達夫，《郁達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徐丹甫，〈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二、三）〉，《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7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原載於《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7 年 6 月 4 日。

徐紀陽，〈「魯迅傳統」的對接與錯位——論光復初期魯迅在臺傳播的若干文化問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6 期，頁 70-78。

章翰，《魯迅與馬華新文藝》，新加坡：風華出版社，1977。

許由，〈一九二九年之中國文壇（一、二）〉，《南洋商報》第 20 版，1930 年 3 月 20、 21 日。

許德發，〈啟蒙、辦學與演說：五四時期馬來亞華人的社會改革與風氣〉，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主辦，「在路上：第二屆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吉隆坡，2019 年 12 月 28-29 日，未刊。

———，〈一九二零年代泰戈爾來訪與馬來亞華人的社會反響——兼論馬華文化與文學的「前左翼」場域〉，張錦忠、魏月萍編，《亞際南方——馬華文學與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離散/現代性研究室，2022，頁 141-180。

陳獨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7 卷 1 號，1919 年 12 月 1 日。

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惜抱，〈文藝家應具的條件〉，《南洋商報》第 13 版，1923 年 9 月 26-28 日。

莊華興，〈魯迅在冷戰前期的馬來亞與新加坡〉，王潤華、潘國駒主編，《魯迅在東南亞》，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7，頁 183-192。

梁家逕，〈五四在南洋的思想軌跡：以《新國民日報》（1919-1923）為探討對象〉，《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3 期，2020 年 9 月，頁 33-56。

張康文，《〈馬華文壇的「魯迅記憶」及其意涵（1945-1965）》〉，丹絨馬林：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文學碩士論文，許德發先生指導，2018。

博夫，〈文藝與生活〉，《星洲日報》（副刊「野葩」第 18 期），1930 年 5 月 2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德誌，〈廚川白村與中國新文學〉，《文藝理論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44-51。

黃佩晶，〈馬華問題小說的五四淵源與其反封建精神——以女子、婚戀問題為中心〉，《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 23 期，2020 年 9 月，頁 57-82。

黃錦樹，〈會意：隱喻與轉喻的兩極〉，《中山人文學報》第 45 期，2018 年 7 月，頁 21-45。

逸郎，〈閒文〉，《南洋商報》第 13 版，1928 年 1 月 20 日。

超民，〈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趨勢（三、四、六）〉，《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4 月 12 日、13 日、16 日。

———，〈近代文學與文學批評（十一、十二）〉，《南洋商報》第 24 版，1928 年 6 月 14、15 日。

楊松年、周維介，《新加坡早期報刊文藝副刊研究（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

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1。

趙余勳，〈讀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篇〉，《南洋商報》第 4 版，1924 年 7 月 21 日。

鄒子孟，〈再向讀者說幾句話〉，《叻報》（副刊「星光」第 75 期），1926 年 8 月 7 日。

鄒賢堯，〈殖民語境中魯迅與馬華文學〉，《魯迅研究月刊》2005 年第 11 期，頁 36-40。

劉紀蕙，《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廚川白村著，魯迅譯，《苦悶的象徵》，臺北：五南出版社，2020。

羅振亞，〈廚川白村的現代中國詩界旅行〉，《文藝爭鳴》2021 年第 4 期，頁 30-38。

鮑國華，〈作為講義的《苦悶的象徵》〉，《新文學史料》2019 年第 4 期 ，頁 87-93。

靈谷，〈從人的生活說到文藝（一至五）〉，《南洋商報》第 20 版，1928 年 5 月 5 日、7 日、8 日、9 日、1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郁達夫的小說〉，《南洋時報》第 13 版（副刊「綠洲」第 127 期），1928 年 1 月 14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